

程曼丽 主编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view

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

第五辑 Volume V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辑专题 五四时期新闻传播史论研究

程曼丽 主编

第五辑

Volume V

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view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 第5辑/程曼丽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 - 7 - 301 - 17408 - 1

I. ①北… II. ①程… III. ①新闻学 - 文集 ②传播学 - 文集
IV. ①G210 - 53 ②G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2621 号

书 名: 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五辑)

著作责任者: 程曼丽 主编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7408 - 1/G · 289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53 千字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编辑委员会

主 任:邵华泽

副 主 任:徐 泓

委 员:赵为民 龚文庠 程曼丽 肖东发

杨伯淑 陈 刚 关世杰

主 编:程曼丽

副 主 编:师曾志

编 辑:王辰瑶

主编的话

90年前,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在中国大地上率先发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由此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90年后的今天,2009年9月6日,来自全国多所高校以及新闻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聚首北京大学,参加由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暨五四时期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共同回顾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探讨五四时期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及其历史贡献。《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五辑所收录的论文,大部分都与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有关。

五四运动虽然过去了90年,它的精神却未曾消逝——它抵御列强外交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抗封建礼教的民主自立精神、破除僵化迷信的革新启蒙精神、促进中西交流的开放兼容精神等,至今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辉。而承载着这一精神的五四先驱们探索新文化,追求民主、科学的爱国热情,则激励着后人勇于担当,不断前行。

因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精神富矿,在开掘的过程中,也难免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譬如“不完善的启蒙运动”说、“文化断裂根源”说,以及对一些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等等。对于这种批判性的言辞,我想说的是:首先,它不足以遮蔽五四运动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意义和价值;其次,既然如此,我们也没有必要拒它于千里之外。毕竟,新文化运动本身就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的特点,一如当年蔡元培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学术研究需要理性。对于学术界而言,纪念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一种礼赞性的仪式,更是立足于当下的历史检视与思考。

本论文集所收录的相关研究成果,就呈现了这种检视与思考。其中既有对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们以报刊为阵地,播撒革命火种、开展启蒙运动的历史功绩的描摹,也有对发端于五四时期并沿袭至今的新闻传播思想、观念的解读分析,比如对新闻本位思想的分析、对媒介批评动力机制的分析、对群众性新闻实践活动的分析等等,此外还有对早已被贴上历史标签的某些“反面人物”是非功过的评说。

或许研究者们看问题的视角与侧重点有所不同,观点也不完全一致(包括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恰恰相反,结构主义方法论告诉我们,事物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只有把它们放在一个整体性的关系网络中,将它们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时,才能更好地被理解。如此说来,视角、观点的多元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可以通过史料及其解读的相互补充、印证拾遗补缺,启人思悟,进而达到对五四时期新闻传播历史人物及现象本质的认识。这也正是“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暨五四时期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初衷及意义所在。

目 录

启蒙时代的总体观照

- 五四新闻史的书写 周光明 沈 静 (3)
-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解读 乔云霞 (16)
- 论五四时期中国媒介批评的主体与动力机制 胡正强 (23)
- 新闻职业化与文人论政传统 王辰瑶 (39)
- 从“启蒙”到“新启蒙”：“群众路线”的历史命运与传播
观念的变迁 王维佳 (50)

历史脉络中的个案解读

-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 肖东发 (67)
- 徐宝璜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邓绍根 (84)
- 资源整合、品牌生产与《新青年》的快速成长 王春泉 (103)
- 鲁迅与《新青年》杂志 张 积 (145)
- 合法媒体与政府关系的理想模式：对“小骂大帮忙”的
新解读 阳海洪 吴廷俊 (165)
- 五四时期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苏联在华的新闻活动
..... 赵永华 (177)
- 1919年日本媒体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研究 王润泽 (191)
- 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理念与言论自由思想 吴 麟 (203)

陈独秀之自由主义新闻观探微	邓 涛 (214)
报人张季鸾的 1919 年	刘宪阁 (222)
论胡政之在五四时期的海外采访	王咏梅 (240)
历史的视觉与视觉的历史	陈卫星 (253)
稿约	(261)

启蒙时代的 总体观照

- ▶ 五四新闻史的书写
- ▶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解读
- ▶ 论五四时期中国媒介批评的主体与动力机制
- ▶ 新闻职业化与文人论政传统
——五四时期新闻观念的转型与延续
- ▶ 从“启蒙”到“新启蒙”：“群众路线”的历史命运与传播观念的变迁

五四新闻史的书写

周光明 沈 静

内容摘要: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五四时期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五四新闻史的书写存在着许多问题,最主要的是它深受革命史范式的影响。不过,近年来五四新闻史的书写,已开始由一元范式向多元范式变化,这一学术走向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可以预料,早先那种重杂志轻报纸、重激进报刊轻温和报刊的书写框架将被重构,这不仅是新闻学术界对“新闻本位”的回归,完整全面地、客观公正地书写五四新闻史也是我们批判与继承五四精神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五四运动;新闻史;书写

一个国家或民族需要历史记忆来维系,而历史记忆必须首先通过历史书写表达出来。历史和历史书写经常是分裂的,^①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历史可以通过“口述”和“书写”这两种方式来表述、记忆和传承,而历史的叙述以书写为主要认同依据。^②不同的书写方式只要是公平竞争,纵然无法完全复原历史,也至少能让当代读者走近现场。但倘若不幸出现了历史话语霸权,其结果必定会长期淡化或屏蔽一部分历史事实,而另一部分则被浓墨重彩。其实,那极可能是些为某种光环所笼罩着的一大堆历史事实的碎片。

① 王迪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② 彭兆荣:《口述/书写:历史的叙述与叙述的历史》,载《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五四运动^①是近代中国的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也是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余波所及,就连九十年之后的当代中国仍时有强烈的感受。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新闻业有着长足的进步,这固然与当时的思潮激荡有关,同时它也是一战后民族经济大发展的结果。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五四新闻史的书写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特定的历史话语体系,而后者旨在论证或强调其革命与执政的政治合法性,从而在历史书写上呈现出听命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的叙事框架。这样造成的后果是新闻史研究成了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研究,而新闻史的真正主体却处于迷失状态^②。可喜的是,最近几年来,学界尝试着一些新的书写方式,开始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突破之旅,其中有许多问题很值得我们及时检讨或反思。

从一元到多元的书写范式

“历史书写理论”认为,书写的历史不是“历史本身”,它包含了书写者的主观建构成分,所以历史的书写不可能是历史的复原,而书写者的主观建构成分中最核心的就是书写范式。“范式”是历史书写所涉及的一个重要概念,由托马斯·库恩首创,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包括一整套的理论框架、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③范式的改变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研究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突破。目前新闻史书写采用了革命史、现代化、自然史、社会史等多种范式,对

① 关于“五四运动”历史阶段的界定目前还未达成共识,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以1915年9月《青年杂志》的创刊为上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为下限;第二,以1917年为上限,1927年为下限,如陈崧所编的《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增订本)、林毓生所著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第三,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为起点,1923年为终点,持这种观点的有张玉法等;第四,以1917年《新青年》杂志和国立北京大学所发起的新思想运动和新文化改革为起点,1921年为终点,持这种观点的有周策纵等。本文对五四时期的界定参照了第三、第四两种观点。本文中,“五四”、“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大部分场合是可以换用的。

② 参见黄旦的相关论文:《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拓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跨学科与多维度——黄旦教授访谈》,《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③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158页。

五四新闻史的研究大体呈现出从一元书写范式到多元书写范式的轨迹,这可从中国新闻史的五四书写中理出脉络。

我国早期的新闻史研究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为代表,许正林将其书写范式称为“新闻事业史范式”或“早期报学史范式”。^①《中国报学史》以陈述报业自身的发展为主,较少关涉意识形态,重视史料和细节的考证。该书对于五四新闻史的书写,并没有将其看作一个单独的历史阶段,甚至没有形成“五四新闻史”这一概念,五四新闻史仅散见于第五章“民国成立之后”的叙述中。

新中国成立后,五四新闻史的书写基本上是与“革命史范式”紧密结合的。革命史范式^②在新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话语的语境中运用,它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唯物史观为指针,因而其书写常常伴随宏大政治叙事,这一派学者对“历史主线”有着强烈兴趣,对历史真相或全貌则不大在乎。这一范式长期以来支配着中国新闻史的书写,成为主流的书写范式。例如,由方汉奇先生编著或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传播史》和大部头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都花了大量篇幅来叙述五四新闻史。尤其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设置专章“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第八章),共设置了六节内容(《新青年》及其主编陈独秀;五四运动和新闻事业;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私营大报的发展;新闻学研究;新闻教育事业的初步发展)进行叙述。这部通史对五四时期新闻史虽尽力铺陈,但主体内容却难以摆脱政治框架,社会革命的视角过于突出,革命实践、阶级分类、矛盾分析等或切分了新闻史的本体,或造成新闻史本体的迷失。^③总的来说,这一书写范式要求将五四新闻史独立出来,并始终贯穿着“运动的新闻史”的基调。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新闻史学界开始对革命史范式进行反思,此后便呈现出了新闻史书写范式的逐步转换和日益多元化的趋势。革命史范式不断受到其他书写范式的冲击,如社会史范式、叙事学方法

① 许正林:《中国新闻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4页。

② 此种范式在中国似乎首先为国民党人所采用,但在台湾学界影响力较小。

③ 许正林:《中国新闻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与文学范式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纠偏”效果,有利于新闻史研究的开拓和进步。杨念群在其近著中就揭示了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史叙事之外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史化”的“五四”研究路径。^①

社会史范式主要从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视角关注历史,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分解历史,转向对鲜活生动的社会生活场面的全面呈现,使历史变得有血有肉。^②李彬的《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以全新的视角和开阔的视野,将新闻传播置于整个社会有机体之中,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联,更对新闻与社会的复杂互动进行了探究,而且不乏趣味性的叙事。以社会史范式书写新闻史的还有陈昌凤所著的《中国新闻史: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等。

叙事学方法,也被认为是书写历史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李彬将此看作新闻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即新闻史研究缺乏叙事,少情寡趣,并认为史学的叙事问题是当代新史学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后现代史学更是将史学径直当作文学。^③这就引出另一种书写范式——“文学范式”,即在历史书写中强调生动有趣的叙事,适当使用一些文学的笔法和语言来书写历史。吴廷俊先生所著的《中国新闻史新修》,不仅采用了新的框架和体例,而且叙述充满文采,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该书对五四新闻史的书写,已经改换了书写体例,该书第七章“新文化运动与启蒙报刊”集中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报刊,而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报刊诞生的内容剔除,移入下一章。该部分的书写也很活泼,比如第一节“启蒙报坛的三剑客”、第二节“启蒙报刊的旗舰《新青年》”。

目前,五四新闻史的研究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多元书写范式之趋势。郭若平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话语方式,当代若干青年学人的研究体现了全新的研究范式转换,已挣脱了旧有的政治宣传模式,从而拓宽了“五四”研究与评论的学术空间。^④用这一观点评价五四新闻史的

① 杨念群:《五四九十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

② 何云峰:《也谈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兼与沈传亮博士商榷》,《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4期。

③ 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④ 郭若平:《评“五四”研究范式的转换》,《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研究现状也是恰当的。

对于五四新闻史的书写,我们还须注意到:五四时期新闻业的发展虽然很快,但还没有达到构成分水岭的程度。“五四”不再是近现代分界点,这就直接影响到了五四新闻史的书写,比如方汉奇先生在1981年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中把五四新闻史纳入现代史框架中,而后确定近现代分界点移至1949年,分期随之变化。同我国台湾学者的新闻史书写做一比较,便发现意识形态与政治框架对大陆学者新闻史研究影响之深刻。赖光临的中国新闻史著作对五四新闻史的书写就较少受到政治干扰,更为客观和学术化。

但是,目前对五四新闻史的书写仍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未得到很好的处理,比如,重政治轻经济、重思潮^①轻习俗、重杂志而轻报纸,在整个报刊业中又重激进报刊而轻温和(或保守)报刊,这说明未来的五四新闻史研究仍具有较大空间。

重杂志而轻报纸

与其说杂志对五四运动有诸多贡献,还不如说杂志较适合生存于五四时期。一般认为,《新青年》的创办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紧随《新青年》之后,《每周评论》、《新潮》、《建设》等一批杂志同《新青年》一样,介绍西方文学、阐明学理、宣传新思潮,为五四运动推波助澜。此前学界对五四时期新闻业的研究,更多地将眼光放在杂志上。例如方汉奇先生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第七章《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就用专节介绍了《新青年》及其主编陈独秀;台湾曾虚白的《中国新闻史》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先倡导,并站在第一线的是杂志,而不是报纸”。该书虽然对《新青年》的研究并不多,但设有专节研究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杂志以及“五四”以后的杂志。

对于报纸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较深的研究并不多见。陈平原所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以《晨报》在五四运动中的新闻报道

^① 朱学勤在《问答案:对一种反省的反省——九十年代学界时风之我见》(日本《中国研究》1996年第9期)中曾提出“思变打不过事变”。许纪霖也持有类似看法。

为线索试图还原五四,刘永明所著《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以《民国日报》在五四运动中的新闻报道为线索描述国民党人的贡献,这两本著作的问世,是值得关注的学术进展。现今对于五四时期报刊的研究,一是较多关注与中共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报刊,如《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对其他报刊却少有涉及;二是侧重从报纸业务改革以及报纸副刊的变化上研究而忽视报纸的其他方面,并认为在五四运动中出力最大的是副刊:“报纸后来虽然也参加服役,但是并没有总动员。而且立大功的,不是掌报社大旗的言论栏,而是被认为‘报屁股’敬陪报纸末座的‘副刊’”。^①

不过,一些学者同时也承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杂志虽然打了头阵,抢了头功,但是如果没有报纸的支持,收效还是有限”^②。这是由杂志和报纸的不同特点所决定的。在社会激烈转型时期,杂志有其传播上的优势,它宜于刊载解释性、忠告性的稿件,尤其喜欢议题或话题丛生的社会环境。对此,从赖光临所著《近代报人与报业》中对《新青年》等学理性杂志的研究可以看出。但是有利也有弊,张玉法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闻与言论》中提及:“报纸的言论较为务实,即配合新闻的发展;而期刊的言论,比较形而上,即谋求基本的改造,期刊的言论,一般而言与时事的关系较远。”^③报纸每天出版,紧随时政发表言论;而杂志出版周期较长,比较适合阐明学理,但不能很好地满足读者对信息的迫切需求。例如,《新青年》杂志,从总体上说是一份思想理论期刊,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曾说:“改造青年之思想,辅佐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它的主要任务是阐明学理,介绍新思想和新文学。《新青年》作为大型理论性月刊,刊期长,又不能准时出版,显然不能适应读者对时政批评的渴求,《每周评论》的创刊部分原因即为此。有学者指出,《新青年》最辉煌的时期是

①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17页。

② 同上书,第324页。

③ 张玉法:《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闻与言论》,参见王洪钧主编:《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67—378页。

1918—1919年,其影响并不能覆盖整个五四时期。^①

实际上,在五四运动时期,报纸与杂志形成了很好的传播组合,春兰秋菊,各擅胜场。

由《申报索引》可以看到,当时《申报》上载有大量关于五四运动的新闻报道。该索引在“五四学生运动”的专题下有842条消息,对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都有详尽报道。以《申报索引—1919》为例,5月的大事记中有这么几条:

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余所学校学生三千余人集会天安门,举行爱国示威游行,火烧曹家楼,痛打章宗祥,五四运动爆发,军警镇压学生,三十余人被捕;

5月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

5月6日,上海学、商、新闻、律师各界,江苏学界、教育界纷纷通电支援北京学生运动;

5月7日,津、宁、沪、浙各界继续通电北京政府支援学生运动,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

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辞职,离京赴沪。

这些新闻及时且连续地报道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为支持学生运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事》、《神州日报》、《时事新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七家报纸一致决定不再刊登日商广告及日本船期汇市商情,这一决议于5月15日起实施,此后长达十六七年之久的时间里,日商的广告商情绝迹于这些报纸。直到中日订立塘沽协定以后,才又重新出现在这些报纸上。^②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对五四的报道也很投入。在五四期间,胡政之是唯一到巴黎和会现场采访的中国职业记者。他的“巴黎专电”使国人及时了解到巴黎和会的议程。1918年12月1日起,《大公报》

^①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② 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18页。